

• 中国哲学 •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

——关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

李 维 武

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往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之不同，并不在于是否承认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数千年中国哲学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不在于是否承认这一变化的根源来自中国从鸦片战争起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模式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以及由此而来的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大规模传入中国；而是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其分歧大致可归结为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中国哲学在 19—20 世纪的巨大变化，对中国哲学传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哲学的主流开展自此背离了中国哲学传统，大概只有现代新儒学才能算是这一传统的真正继承者；因此，21 世纪的中国哲学只有回归 19 世纪以前的中国哲学传统，才能接上中国哲学的正统。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哲学在 19—20 世纪的巨大变化促成了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继而现代形态的转变，在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后形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因此，21 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当以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为起点，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而作新的发展。这两派不同的看法，鲜明地反映了在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两种哲学史观的分歧，直接关系到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理解与书写，也直接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笔者赞成后一种哲学史观，在这里试对自己的有关思考加以阐发，以期引起研究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一、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轴线

鸦片战争以来的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不仅就其复杂性、多变性言，而且就其创新性、深刻性言，都是以往时代的中国哲学发展所难以比拟的。这种创新性、深刻性在于，在这一个多世纪纷繁复杂的哲学格局中，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主轴线，即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继而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所谓哲学的形态，是指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和话语系统，规定了一定时期的哲学文化风貌，使之与以往时代的哲学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哲学的形态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但又不是凝固的、永恒的、僵硬的，不仅有量的变化，更有质的更新。随着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随着由之而来的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20 世纪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编号 05JJDZH24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近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编号 09&ZD069）的阶段性成果。

思想世界的变化，哲学的形态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变化，由旧的形态逐渐转换成新的形态。这种哲学形态的更新就是哲学的转型，由此而造成了哲学发展的大的阶段性的区分。

从世界哲学发展的视域看，不同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尤为鲜明和典型，呈现出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继而现代形态的相当分明的发展阶段，其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整个哲学文化风貌表现出明显的质的差异性。自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伴随着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模式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向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传播，与这些民族原有的哲学发生冲突与融合，促使它们由古代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转向现代形态，从而促成了不同民族的哲学走向世界哲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哲学由于这种示范和推动作用，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性，使得前近代的非西方民族在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后，必须引入、学习、吸纳西方哲学的思想内容。这样一来，西方哲学的转型就往往成为研究者们衡论不同民族哲学转型的一个尺度、一个参照系。由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通过中西古今哲学的彼此争鸣、相互激荡、重新熔铸而实现的，因此在考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时，也少不了使用这样一个尺度、这样一个参照系。

由此来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可以看到其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哲学又开始了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封建统治者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开始从政治哲学入手思考这种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自改革”的主张。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开眼看世界，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龚、魏的新思想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的发展，使得中国人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政治哲学最终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框架与内涵。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更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突破。康、谭沿着中国古代哲学杂糅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传统，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观念结合起来，建构起具有近代哲学特征的本体论体系。严复则引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与现代实证主义原则作为新哲学的基础，解构了中国古代哲学杂糅本体论与宇宙论的传统，建立起以牛顿力学与达尔文进化论为框架的科学宇宙论，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同时又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端。这样一来，中国哲学仅仅用了短短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并进而开始了向现代形态的转变。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哲学中的不同思潮相继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家对于西方哲学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如果说严复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科学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进化史观有开启之功，那么王国维则开始把西方人文主义哲学引入中国，并敏锐地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中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分歧与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这时传入中国，受到当时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关注和介绍。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更是意义重大。其中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分别凸显和深化了中国人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政治哲学问题、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使得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由此进入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哲学家开始融会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了代表不同哲学思潮、具有不同哲学风格的本体论、认识论体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与“知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张岱年的“天人五论”，等等。这些各具个性与特色的哲学体系化创作，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以后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都与这些标志性成果分不开，从不同方面推进、深化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因此，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作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轴线是不可否认的。看不到这一主轴线或否认这一主轴线，当然只会把中国哲学在19—20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理解为对中国哲学传

统的破坏。相反，只有抓住了这一主轴线，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所经历的这一巨大变化，揭示其间所蕴涵的创新性、深刻性，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作出正确的看待、本质的理解和合理的书写。

二、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总特点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尽管是在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转型是对西方哲学发展进程的简单模仿、照抄照搬，更意味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由此纳入了西方哲学的轨道；相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基础、背景与语境，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通过两种哲学运动鲜明地呈现出来：一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一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两种哲学运动在实际的哲学发展中是合为一体的，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总特点。

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中的各种理论、体系、思潮先后传入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但这些传入中国思想界的西方哲学思想，在影响、促进、参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既显示了自己世界性的一面，又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与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和阐释，经过一番新的思想创作，或者在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传统中找到契合处，或者参与到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来：只有这样，一种外来的哲学才有可能真正为中国人所接纳，进而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成长，使自己逐渐转化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这个过程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所追求的目标，是要把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而不是要对这些内容进行大部的或基本的消解，使西方哲学只剩下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相似相通的内容。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积极地学习、引入、吸纳西方哲学，正是为了从中获得这些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使中国哲学从这些新的思想资源中获得新的生命活力，从而塑造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早在 20 世纪初，严复就指出了这一点“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严复集》第 1 册，第 118 页）因此，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运动中，又必然有选择地保留和自觉地吸取西方哲学的这些核心观念，使之转化为近代形态中国哲学或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样如此。诚如艾思奇所说“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艾思奇文集》第 1 卷，第 481 页）

正因如此，“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早在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就已经在自己的古代形态中孕育了近代形态的因素，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并没有能够发育成熟，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母体中产生出独立的近代形态中国哲学。对于这一哲学文化现象，侯外庐形象而深刻地称之为“中国近代思想难产”。（侯外庐，第 585 页）近代形态中国哲学的“难产”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中叶，才由于鸦片战争所开始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而发生改变。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先后引入中国思想界，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哲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影响，古代形态中国哲学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强烈挑战和猛烈冲击。在西方近代和现代哲学思想的启迪下，中国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检讨、批判古代形态中国哲学，力图创造新形态的中国哲学，重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在时代风潮影响下有此自觉，梁漱溟就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梁漱溟全集》第 2 卷，第 136 页）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固然是对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超越，但同时又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有着联

系。中国哲学在数千年自成一系的发展中，积淀了丰厚的资源，形成了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具有巨大的历史惰性、影响力、渗透力，制约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一方面，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以其传统的巨大力量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发生阻碍作用，是造成“中国近代思想难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中的一些因素，又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发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那些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起着促进作用的传统因素，就其性质来说又十分复杂：其中的一些内容，属于明清之际在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中就已孕育的近代形态的因素，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构想，就曾为梁启超、谭嗣同吸取以倡民权共和之说；还有一些内容，则是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中很早就已存在的因素，本身并没有什么现代性可言，但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发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如经世致用学风、公羊三世说、民本思想就是这类因素的典型体现。在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下，中国哲学家在鸦片战争后直面中国文化历史的大变局，冲破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与文化观，积极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引入、接受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促成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公羊学的三世进化观念则成为19世纪先进中国人主张改革、进行维新的哲学根据：中国哲学家通过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进化理论的结合，重新复活了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小康”与“大同”观念，用以标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为古老的大同理想注入了全新的内容。至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更成为中国先进思想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桥梁。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他自身的思想因素上看，在于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通过吸取儒家民本思想资源，形成了重视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民彝史观。正是基于对民心向背所体现的历史合理性的尊重，使李大钊在当时诸多先进中国人中首先敏锐地觉察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并加以认同。这些哲学文化现象表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既是对它的超越，又是对它的继承。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作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总特点，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既有与西方哲学发展相似相通的一面，又有与其不相同的一面：前者反映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改变了中国哲学原来的长期封闭状况，汇入了世界哲学进程；后者反映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将继续保持中国哲学传统，而与其他民族的哲学相区别。只有看到这一总特点，才能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有深切的了解与把握。

三、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所造成的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上的重构与转变，集中表现为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的改变。这一转型中所出现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运动，首先就在于形成一种新的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因此，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应当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把握、来探讨。

哲学史上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如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都是哲学史上的老问题，为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反复探讨、不断思考。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家往往基于各自的时代和传统，对这些提问方式和问题作出各具文化历史特点的理解和回答。这就形成了哲学发展的内在的逻辑环节和逻辑进程以及与文化历史的密切联系。二是直接来自具体时代、具体民族的文化历史的提问方式和问题，这些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不是每个时代、每个民族哲学发展中都会出现的，它们往往处于一种哲学史与思想史交叉的边缘性位置，其哲学理论不那么具有思辨性，其哲学意味也不那么浓厚，但它们使得哲学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各异的民族风格。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存在着这两类提问方式和问题：一方面，这一发展对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作出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转换，在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上多有创获；另一方面，这一发展对于那些直接来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予以了重视和思考，如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家反复探讨的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就是这类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由于来自这两类提问方式和问题，因此相互之间不都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层次性和结构性。从逻辑上看，即从哲学观念由一般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看，这些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最抽象的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居中的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最具体的是政治哲学问题。

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哲学自身长期探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本体论问题尤为古老。随着哲学形态的发展，本体论变换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在对本体论的反复探讨中，哲学家们或建构或解构一个个哲学体系，由此而抒发理想，寄寓希望，倾注感情，寻求智慧，重建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西方哲学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是环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而展开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同样也是环绕着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家基于自己的时代和传统，对于这些问题作出了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回答。近代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法。可以说，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是以本体论及认识论问题为中心和重心的。

历史观、文化观问题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说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问题，但更主要的内容却是与19—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和中国文化的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鸦片战争后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模式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巨大变迁的历史，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而造成中西古今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会的历史，是中国由封建社会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历史。这就使得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占有了十分显著、重要的位置，引起中国哲学家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而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又是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也使得这一时期中的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不是一种思辨的形态，而是一种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相联系的具体形态。

政治哲学问题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有着特殊的含义，所要直接回答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个老问题，而是一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新问题。在这一文化历史大变迁中，环绕“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成为19—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所没有的，也往往与现实政治纠缠在一起而较少思辨性，但对于19—20世纪的中国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引起了中国哲学家反复的思考与探讨。正是这种反复的思考与探讨，逐渐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是以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纯粹哲学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例如，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女性主义问题，原本是作为社会问题提出的，但其中有关性别意识、家庭观念、女性伦理、男女权利诸问题，都包含了哲学层面的探讨，所以实际上又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又如，新文化运动中凸显出的中国教育思想问题，原本是作为文化问题提出的，但其中又必然涉及到人性改造、人格培养、教育民主诸问题，需要在教育哲学

的意义上进行探讨，因而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的多方面联系，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丰富内涵，因而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时需要注意的。

四、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主要思潮

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特别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涌现了诸多不同的哲学思潮，它们此起彼伏、相激互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所谓哲学思潮是指一定时代的哲学家们由一定的致思趋向和价值认同所形成的哲学思想的开展。通过对哲学思潮的研究，既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走向与学术源流，又可以使哲学史研究获得比较明晰的线索。

由于这些哲学思潮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既相互争鸣、彼此交锋，又相互交叉、彼此纠缠，使得认识与把握19—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的划分过于简单。艾思奇在1933年所写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把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哲学划分为三大思潮：一是“输入底资本主义型之哲学”；二是“封建底哲学传统之不断的复归”；三是唯物辩证法哲学。在最近30年中，很多学者又提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三大主要思潮。笔者则在199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中，提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三大主要思潮。随着对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笔者逐渐感到，自己的上述思潮划分固然仍能适用于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的解释，但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作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则很难说是周延的解释和准确的说明，因而需要有一种新的拓展。第二个问题是把19—20世纪中国哲学中不同层面的思潮混为一谈，都视为一种思潮。如科学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思潮原本是三种不同性质的思潮，但由于其中存在着交叉的内容，如胡适既是科学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还是西化思潮的提倡者，因而就有不少研究者把这三种思潮混而视之，以为就是一种思潮。其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像胡适那样将这三种思潮集于一身者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如张君勱、徐复观都是20世纪中国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们都不赞成科学主义和西化思潮，而是哲学上的人文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笔者认为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中，应当把哲学思潮的划分同哲学问题的划分结合起来，根据各种思潮对哲学问题的探讨来区分不同性质的哲学思潮。因为某种哲学思潮总是针对某种哲学问题而发生、而发展的；环绕不同层面的哲学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思潮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因此，根据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可以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思潮作一种结构性、层次性的划分。

第一，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环绕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三大思潮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相继出现于中国思想界。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互动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勱认为现在正是“新玄学时代”；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但又表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化倾向，强调只有作为社会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有代表性的本体论、认识论体系，都是在这三大思潮的探讨与互动中建构的。

第二,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环绕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逐渐形成了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唯物史观三大历史观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形成了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三大文化思潮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在这些思潮的复杂联系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前期冯友兰的历史哲学、晚年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都曾吸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吸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吸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直接结合起来。此外,在20世纪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环绕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也形成了一些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在当时却颇有影响的思潮,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战国策派思潮即是一例。

第三,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环绕政治哲学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潮。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引入西方政治思想及政治哲学,提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新设计,政治哲学思潮开始出现新格局,先后出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阶级反抗运动与早期改良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有不同政治哲学思潮相互激荡、影响一时,如以严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思潮、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政治哲学等。经过这一时期的思想论争与政治实践的选择,环绕政治哲学问题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潮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既有过分歧与对抗,又有过联盟与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等,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吸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互动中,显示出了自身的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的诸多思潮,通过这一结构性、层次性的划分,可以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分疏和比较清楚的展现。由此来看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能够透过纷繁复杂、起伏纵横的哲学思潮,对其基本格局和基本框架有一个更为明晰的把握。需要说明的是,从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来划分哲学思潮,并不是要把这些哲学思潮作一种截然的分开。一些不同层面的思潮在实际的历史中本是一个统一的思潮,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学就是如此。但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说明20世纪中国哲学进程的复杂性,在这里作不同问题层面的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作三个问题层面的展开;现代新儒学在本体论问题上作为人文主义思潮的主流,而在文化观问题上则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派。不同层面问题上的思潮其间当然也存在着联系,有的甚至是十分密切的联系。例如,科学主义思潮与进化史观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科学主义思潮以进化论为方法解释历史、说明现实,导致了进化史观风行一时。又如,现代新儒学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其所建立的本体论体系分别称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很直观地反映了两者间的联系。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与由他创立而后成为国民党政治哲学的三民主义之间,也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

除了这三个层面的哲学思潮外,在19—20世纪中国思想界,还存在着各种具有哲学内核的社会思潮。与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思想相比,这些社会思潮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吸引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响应与参与,甚至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但就这些社会思

潮最核心的内容看，往往仍然是以哲学家思想家的思想创造为其主体。特别是一些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具有鲜明奋斗目标的社会思潮，其间都存在着经过哲学家思想家的自觉创造而形成的哲学内核。这些思潮尽管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却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有其自身的活力与价值，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

总之，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对哲学思潮的研究与对哲学问题的探讨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果说哲学问题是19—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的纽结，那么哲学思潮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之网的主线。以问题为中心，以思潮为线索，可以比较好地把握19—20世纪中国哲学之网，比较好地展开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研究空间。

五、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

中国哲学在自商周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自成一系、源远流长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古代传统。这一传统固然有着巨大的历史惰性，但随着19—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与思想界的大变动，特别是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深刻影响下，也发生了变化以至更新。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新传统，即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相区别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也可称之为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

由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以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为其总特点，因此，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是在中西古今文化及其哲学的碰撞、交流、融会中实现的。这就使得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从内容上看，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一些属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古老的哲学因素因其巨大的影响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过程中积淀保存下来，转化成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第二，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又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实现的。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特别是那些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中具有近代价值或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经过中国化过程后，逐渐为中国思想界所吸纳和融会，成为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中国哲学家在19—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通过吸取、消化、综合、融贯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自己的新的哲学创造，通过近代形态哲学体系、特别是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彰显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原创性智慧，标示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实现。这些新的哲学创造当然是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最为重要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主体。

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继承，也有对其的更新，表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并不是脱离了数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而是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只是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更新与继承相比处于主导性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如非这样，有着数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要在短短一百多年间实现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将会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这一特点使人们在看待它的时候，往往不易作出准确的把握。正是因此，在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关系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大致归纳为两种：

一种看法是竭力否认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这种看法认为，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哲学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孔子开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至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及哲学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则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冲击、破坏和背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只存在着一种传统。这种观点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早在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

杜亚泉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杜亚泉文选》,第307-308页)因此,他坚决反对引入西方思想来冲击和破坏中国思想传统,认为“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同上,第311-312页)这一观点到今天仍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认同和延续,以反对“激进”、反对“西化”、反对“反传统”为旗帜,形成对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否定性批判。在他们看来,中国哲学现代转型诸思潮中,大概只有现代新儒学才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相接续,体现了中国哲学在19—20世纪发展的正确方向。

另一种看法则是认肯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存在及其合理性。这种看法认为,中国哲学固然形成了自己的古代传统,但这种传统并不是永远如此、凝固不变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经历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继而现代形态的转变,促使中国哲学的传统出现了改造与更新,形成了不同于古代传统的现代传统。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并不是只有一种传统,而实际上由于传统的变迁、转化和更新,存在着两种传统。主张这一观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者,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0页)在这里,他从总的文化变迁上立论,揭示了中国文化思想新传统形成的代表人物与主要环节。冯契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问题,指出“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冯契文集》第8卷,第608页)“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同上,第9卷,第513页)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或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

这两种看法不仅涉及对中国哲学历史的理解,而且还关涉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在今天谈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传统的问题。如果持前一种看法,就会把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定位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或现代新儒学,要求21世纪中国哲学只是接着19世纪前的古代形态中国哲学讲,或至多只是接着20世纪中的现代新儒学讲。如果持后一种看法,则会把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定位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要求21世纪中国哲学沿着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不是置19—20世纪中国哲学于不顾而以19世纪前的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作为出发点。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将深刻地影响到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

当然,以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需要对这一传统作具体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需要有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不足与局限的改造与克服。所谓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的继承,就是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视域出发,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相关联的哲学运动中,发现、肯定、继承对促成这一转型起过积极作用的全部哲学探索和思想创作,不仅发现、肯定、继承其中的那些中国古已有之的因素,而且发现、肯定、继承其中的那些中国今才有之的因素。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都是20世纪中国哲学全部积极成果中的重要内容,都是值得21世纪中国哲学重视和继承的中国今才有之的因素。把这些内容和因素都视为“激进”、“西化”、“反传统”而加以拒斥和抛弃,仅从

中国古代哲学资源出发，在儒家哲学中打圈圈，是不可能建构出能够回答21世纪诸多重大哲学问题的新的中国哲学理论形态的。所谓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不足与局限的改造与更新，即要求对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取历史批判的态度，看到由于时代条件和哲学家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这种不足和局限之最为主要者，一是在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过于急迫和短促，一些在今天看来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哲学问题未能深入展开，如价值问题、自由问题、民主问题、平等问题、个性发展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等，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得到充分的探讨；二是在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实现的，因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的吸取与继承尚有许多不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核心的和精华的内容及其现代意义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与充分的显发，即使是现代新儒学所建构的一系列本体论体系也存在未能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的困境。这样，就有一个对中国哲学现代传统进行完善、加以发展的问题。因此，以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作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出发点，既是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继承，也是对其的更新；既是直承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而作新开展与再创造，也是对全部中国哲学传统的新阐释与再继承。

六、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

以上关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观的思考与阐发，归结起来，就是在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中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表现为时间向度与空间向度两个方面：从时间向度看，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要处理好中国哲学发展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在这里，需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尤其需要把握好一个“变”的问题，不仅要看到中国哲学在一百多年间的变化发展，而且要看到这种变化发展中还有哲学形态的转变与哲学传统的更新。从空间向度看，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要处理好哲学史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在这里，需要有“近代中国”的历史意识，要重视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与19—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密切关联，要重视那些直接来自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的提问方式和问题，要重视环绕这些问题所出现的不同哲学思潮间的相激互动，要重视在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基础上所出现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如能在这两个方面都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原则，那么关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就能获得一种真实厚重的历史感，既能深刻把握这一段哲学史的主轴与脉络，又能为这一段哲学史开拓出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 《艾思奇文集》，1981年，人民出版社。
《杜亚泉文选》，199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冯契文集》，1997年、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侯外庐，1947年《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生活书店。
《梁漱溟全集》，199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严复集》，1986年，中华书局。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冯国超